

政治媒介化的歷史考察

——評馬建標《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

● 王 毅

自十九世紀起，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急需開拓全球市場。隨着國際貿易日趨頻繁，大批西方傳教士前往中國，他們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傳播基督教義和現代科學知識，溝通商情，由此悄無聲息地撼動着當時的清廷統治。



馬建標：《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人類社會在歷經口語傳播和文字傳播時代以後，隨着十五世紀中葉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推廣，開始

步入印刷傳播的時代。至十九世紀中葉，印刷技術的改進及應用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更成為推動公共教育發展、普及知識、傳播思想、促進政治變革的重要推手。正如傳播學大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所述，印刷媒介的技術進步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社會需求相結合，對隨後的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這一發展在滿足人們對知識渴求的同時，也激發了對於既有權利資源配置的質疑與挑戰。由此至十七、十八世紀，以書籍與政治印刷品為代表的印刷媒介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政治生活與革命運動中去^①。

自十九世紀起，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急需開拓全球市場。隨着國際貿易日趨頻繁，大批西方傳教士前往中國，他們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傳播基督教義和現代科學知識，溝通商情，由此悄無聲息地撼動着當時的清廷統治。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大約七十年的時間裏，不斷衰微的滿清

統治最終走向土崩瓦解，中華民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孕育而生。議會共和取代皇權統治，中國隨着天朝朝貢體系的崩塌開始融入現代國際秩序。

近代中國經歷着正統衰落、邊緣上升的「權勢轉移」，傳統士人面對西潮衝擊做出應對，由此引發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生活的變革^②。然而，除了上述這些顯性因素外，隱藏在歷史深處的媒介因素卻難以在主流歷史書寫中獲得足夠重視。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馬建標教授的著作《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以下簡稱《權力與媒介》，引用只註頁碼）則注意到在近代中國權力鬥爭與思想文化變革背後，資訊傳播媒介所發揮的推動作用。作者試圖從傳播媒介的發展以及傳播技術的應用切入，探討十九世紀40年代以後七十年的時間裏，新式傳播媒介的發展與近代中國政治演進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以此呈現傳播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何以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在隨後的歷史演進中，它又如何改變人們的思想認知與社會行為方式；進而探討它在推動近代中國政治劇變過程中扮演怎樣的角。本文首先簡介該書的內容，然後圍繞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即新式傳播手段與近代中國變革，以及資訊傳播視域下的政治史敘述，展開進一步探討。

一 內容提要

《權力與媒介》全書共有七章，作者基於時間順序與個案研究建構

論述框架，同時也結合傳播技術的發展、應用及其在近代中國政治舞台所扮演的角色，審視清末民初資訊技術及媒介發展所形塑的近代中國權力更迭與政治變遷。

在第一章「徘徊在帝國邊緣的異類」中，作者觀察到撼動着看似固若金湯的清廷中央權力的，恰恰是那些遊走於帝國邊緣的人物，如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洪秀全和王韜。他們因掌握新式傳播媒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治權力中心。馬禮遜印刷發行宗教報刊，不僅為隨後的西方傳教士步入中國提供了示範，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構起清廷官僚體系了解外部世界的平台。對此作者提出，「沒有傳教士的文化傳播，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日程也許會大大推遲」（頁13）。洪秀全之所以能夠掀起風起雲湧的反清浪潮，在作者看來，並非由於他在領悟宗教教義方面有過人之處，而是源於他能夠熟練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與靈魂附體的巫術儀式，對基督教義進行本土化傳播。此外，帶有宗教性質的領袖崇拜與顛覆現有習俗禮制的社會狂熱也將這場反清社會動員推向高潮（頁31-32）。王韜通過創辦《循環日報》獲得了對資訊的掌控權和傳播權，並將其轉化為引導社會行動的資本，由此形塑出口岸知識份子主導的「信息中心」，從而形成某種全新的「中心—邊緣的權勢網絡」（頁54-55）。

第二章「盛宣懷與晚清媒介網絡」重點探討資訊媒介在十九世紀中葉洋務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內涵不僅限於模仿西方工業技術，亦是一場近代

作者注意到在近代中國權力鬥爭與思想文化變革背後，資訊傳播媒介所發揮的推動作用，試圖從傳播媒介的發展以及傳播技術的應用切入，探討十九世紀40年代以後七十年的時間裏，新式傳播媒介的發展與近代中國政治演進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